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GUJIN ZHONGXI JIAOHUI CHU DE JINDAI XUESHU

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

李 帆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

李 帆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 / 李帆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0987-6

K ①古… II. ①李…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397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16.5

字数: 246 千字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策划编辑: 李雪洁 责任编辑: 郭瑜 李洪波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

目 录

上 篇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3
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8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与近代的戴学复兴	25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戴震	34
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戴震	43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56
严复论中西学术	68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77
拉克伯里学说进入中国的若干问题	93
“文化形态史观”的东渐	103

下 篇

仪征刘氏学术述略	117
刘师培论清代经学	132
刘师培对康有为变法理论的经学驳难	151
刘师培、严复吸纳西学之比较	161
刘师培对拉克伯里等学说的接受与阐发	173
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等学说的接受与阐发	184
辛亥前夕刘师培的转向	193
陈独秀与刘师培	201
刘师培与北京大学	210
《刘申叔先生遗书》编误举例	228
附录一：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國研究	233
附录二：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导读	249
后 记	255

上篇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近些年来，学术史的研究成了学界的一个热点，相关著述一再问世，讨论的问题也越发宽泛，触角深入到不少领域，甚至大有取代传统思想史研究之势。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尤其如此。

关于学术史何以会在近些年蓬勃兴起，一些学者曾作过探讨。有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热入手，认为从关注文化史到关注学术史，“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当年人们关注文化问题，是多年激烈的政治动荡之后的反省有以促成之；而今日之关注学术史，则又是多年的文化热之后的反思有以促成之。”^①也有学者引入晚清时人对学术史的关注为参照系，认为当时学者之所以热衷梳理学术史，“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同样道理，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②这样的结论，大体是考量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在环境而得出的。的确，从文化史到学术史，是学术逻辑演化的必然；而20世纪末的时代情境，跨世纪的特殊氛围，恰好强化了这一逻辑，当时各类学术刊物（如《历史研究》）连篇累牍地回顾和总结20世纪学术历程的情形，即可证明此点。也就是说，世纪之交，借学术史的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反思和检讨走过的路，以使中国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成熟地走向未来，不失为一种非常好的思路和做法。这与百年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关注于自身学术所由出的有清三百年学术史的总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正由于今日学者更多关注的是近百年的学术史，所以令得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在整

^① 耿云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序，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个学术史研究中居于显赫地位。

谈到中国近代学术史，自然不能仅以近百年为界。众所周知，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实际是中西交融的产物，一方面继承中国古典学术传统；一方面接受欧风美雨的冲击，中、西学术相激相荡，相融相合，铸就当今的学术风貌。这是个剧烈变化的过程，其源头早超出百年之外。王国维曾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来概括有清三百年学术。^① 他所谓“道、咸以降之学新”固然是指道光、咸丰以来之经、史、地理之学不同于乾隆、嘉庆时的专门之学，“务为前人所不为”，但如将其意扩展开来，却也可用其指代道、咸以来一切学术新变化。实际上，这些新变化在嘉、道之际已显露端倪，即随着作为清学表征的乾嘉考据学从这时起逐渐走下坡路，而今文经学、理学、诸子学等相对趋于显赫，学术出现多元化局面，为此后的学术转型奠定了包容性的基础。如果说近代学术之所以为“近代”，是以其有不同于古代学术的面貌，那么对中国而言，所谓“近代”学术即指中西学术交融互释所带来的学术新貌，而其前提就是学术的多元化与包容性。至于道、咸之后西学的传播，则是直接促成学术转型的最关键因素。谈及西学进入，不能不强调甲午战争这个重要时间点。1840年的鸦片战争固然是清王朝命运变化的一个标志，但对晚清读书人来说，甲午战争老大帝国败于蕞尔小国的命运，则是对其心灵和精神的更大冲击。《马关条约》签订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他们心头。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② 这样的认识，表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迅速唤醒。民族意识的觉醒，必然带来民族主义的勃兴。知识界中的先进分子在强敌树立的成功样板前，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学术立场。于是，变被动为主动，以敌

^①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王国维文集》第一卷，97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第6册，《饮冰室专集》之一，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

为师，敞开胸襟，积极吸纳导致日本成功的西方思想、学术精髓，自觉地以西学来改造中学。这样，道、咸之后在中国传播开来的西学发生突变，不再是缺乏章法的缓慢进入，而是有章法的大举涌入，成建制、成体系，并以人文社会科学著述为主。如此一来，与中国固有学术的契合一下子容易起来，从而加快了学术转型的步伐，使中国学术开始追步世界。这恐怕是倡导“学术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一个途径。大体而言，学术转型的完成是在五四时期，这是不少学者的共识。换个角度来看，学术转型的完成，等于是现代中国学术的确立，所以五四时期似应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下限，如此，中国近代学术的过渡性特征才得以凸显出来。总之，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嘉道之际、甲午战争时期、五四时期三个时间点的把握至为关键。

笼统来说，中国近代学术史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文化史研究的共有特征。但学术之为学术，自有其不同于文化、思想的独立特征，所以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就应与文化、思想史有所区别。追根溯源，“学术”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一般泛指学问、道术（据《辞源》），但“学”与“术”不同。《说文》释“学”曰“觉悟也”，释“术”曰“邑中道也”；“觉悟也”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故言“古教、学原为一字，后分为二”，“邑中道也”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前者渐渐引申为学说、学问，后者渐渐引申为技能、技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引申为技术”），而且有了形上、形下之分。形上之“学”备受士人重视，甚至皓首以穷之；形下之“术”则被看做雕虫小技，向遭冷遇。这种状况持续千年以上，直到西学进入中国。对西学，人们先以形下之“术”来格义，认为“西艺”（工艺技术）能包蕴西学的全部内容。到清末，随着认识的深化，已知道西学亦有其根本，遂以中国之“学术”来格义它，如严复所说：“学者，即物而穷理……术者，设事而知方”；^① 刘师培也说：“学指理言，术指

^① 严复：《政治讲义》，见《严复集》第五册，12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用言”，^①“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②学与术不可分，共同构成科学系统，促进西方的进步。反观中国，学与术分离，言学不言术（日常所说“学术”仅指“学”）。以此，学术无由进步，国家亦无法振兴。以西学为坐标对中国学术所作的反思与批判，必然使得一些有识之士会对中国学术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力求从其发展脉络中找寻失误之源。这正是当年学术史走上学术前台并成为显学的现实依据。相较而论，今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时代环境与当年有很大不同，但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却无根本差别，同样需要以西学为参照系，探讨有“学”有“术”、有“体”有“用”的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当然，学术与思想紧密相关，二者常常合而为一，所以直到今天，学术与思想或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界限，仍是尚未厘清的问题，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成为学者所追求的目标。也许不必刻意区分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领地，同一研究对象，切入的角度不同，便会显示出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差异，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思想史的研究会赞赏它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学术史的研究则会孜孜于该书内容的学理探讨，从而不会对它作出很高评价。一个是强调作用于人的精神，震撼人的心灵，引发人的思考；一个则强调是否合于学理，论据是否充分，论证是否严密。理路的不同，带来结论的差异。如果不强分畛域，面对思想史或学术史的不同课题时，依据课题具体情况，或侧重思想史视角，或侧重学术史视角，采两者之长灵活运用之，也许研究成效会更理想。

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思想史的视角固然非常重要，文化史的视野也必不可少。思想二字从“心”，集中在人的心灵、精神层面，较为空灵；学术虽也有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更重求真求实，强调脚踏实地；文化则具有包容性，精神、物质两个层面都在其中。较之思想的超越古今、天马行空，学术的步伐相对笃实，而且对外在环境依赖较大，近代学术尤其如此。近

^①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见《左盦外集》卷八，钱玄同等编：《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排印本，147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② 刘师培：《国学发微》，见《刘申叔先生遗书》，480页。

代中国，社会空间扩大，学术也愈来愈脱离国家、政府的控制而走向独立，不过这种独立是需要条件保障的，如软环境方面的观念形态，硬环境方面的制度建设、物质保障等。要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学科、学人、学术著述等自然是主要对象，但对保障学科发展、学人能够独立从事研究的观念形态、制度建设、物质条件等因素也不能弃之不顾，这些甚至是近代学术得以成立的前提。广义而言，这几方面都在文化史视野之内，无论是属于精神上的，还是属于物质上的，都是文化史研究课题中必有之义。所以，学术史的研究离不开文化史的视野，中国近代学术史应以中国近代文化史为基本依托。

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 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该问题发生甚早，到清代乾、嘉、道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立场各异，由此导致某些学术现象的出现，甚至引发嘉道之际的学术转换，为理学的再度复兴提供了某种契机。所以，以汉宋之争和汉宋兼采为线索，探讨嘉道之际的汉宋关系问题，有其学术上的意义所在。

所谓“汉学”，原本是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在清代，考据学是学术之主体。考据学以考经为主，是儒家经学发展到清代的产物，由于以尊汉学为治学宗旨，故也可称汉学。也就是说，汉学即清乾嘉学派所治之学的统称，尤其在与“宋学”对称之时。所谓“宋学”，主要指宋代（也包括元、明）程、朱和陆、王两派的理学，同“汉学”相对。此外宋学又有广义，即泛指宋代的学术，非专指理学。不过清人眼里的宋学一般仅指理学，非广义之谓。

乾嘉之时，理学被笼罩在汉学氛围下，有远见的理学之士大都注意吸纳汉学之长，在阐发义理的同时不放弃考据，并将考据的成果用来为义理服务。甚至有的理学家开始摒弃门户之见，综诸家之长，不论汉、宋。反过来，汉学家也不是一味规避义理，不少汉学家兼求道理念，以训诂求义理，时有新见问世，开出义理新局。所以，汉、宋两学在当时并非截然对立，判若云泥，而是有相通的地方，至少有相容之处。

不过，乾嘉之际的学者虽说大都对汉、宋学有持平之见，但汉、宋两学究属不同学术体系，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各具特色，所以双方时有争议是很正常的现象。广义上说，这样的争议都可笼统归为汉宋之争，有清

一代皆贯穿之。狭义上说，所谓“汉宋之争”，则指嘉道年间江藩与方东树围绕汉宋问题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

江藩(1761—1831)，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江苏甘泉人。年少时受业于惠栋弟子余萧客、江声，通惠氏之学。与扬州地区的汉学家汪中、焦循、李惇、刘端临等，都有深交。乾隆时，曾襄赞《四库全书》的纂修。嘉庆间，入两广总督阮元幕中，参与修撰《广东通志》，乘便刊行所撰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后又撰《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此二书为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清代汉学家最重家法，吴派学者尤为严守师训，江藩自少追随吴派门人，被培养成为纯正的汉学家，一以维护汉学自任。他写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即有这方面的用意。他说：“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按余萧客别字古农）、同宗艮庭（按江声晚号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按指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暇日论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篇，以备国史之采择。”^①从这段文字来看，江藩写《汉学师承记》的动机很明显，就是通过为清代汉学家修史立传的方式，将惠、戴已经昌明的汉学延续下去。嘉道之际，汉学既处于发展的顶点，同时又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攻击，开始走向衰落，所以江藩要效仿先人，借助于学术史的编修，明确汉学传承，承袭汉学家法，从而延续汉学血脉，并力求将其发扬光大。^②

《汉学师承记》共八卷，卷一收录清代汉学开山人阎若璩、胡渭等；卷二、卷三收录以三惠为代表的吴派学者；卷四收录王昶、朱筠、武亿、洪亮吉等汉学家；卷五、卷六收录江永、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者；卷七主要

①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见《汉学师承记》（外二种），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② 按通过编修学术史的方式助于学术振兴与发展，江藩之前不乏这样做的学者，如黄宗羲之撰《明儒学案》。

收录扬州地区的汉学家；卷八收录黄宗羲与顾炎武。起初江藩只编了前七卷，其收录标准，以依据汉人之说研治名物制度、小学训诂者为主，而于开清代学术风气之先的黄宗羲、顾炎武，则摒之不录，认为：“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①后以二人之学术地位非可轻予否定，始编为第八卷，附于全书之后，使全书编制明显失调。由此可以看出，该书门派家法色彩之浓。在江藩眼里，阎若璩、胡渭之学是真正的“专门汉学”，宜放在卷首，而黄宗羲、顾炎武既“深入宋儒之室”，又“以汉学为不可废”，实为“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即黄、顾主汉宋兼采，不专宗汉学，所以不能作为乾嘉汉学之先导。由于要专门为从事纯汉学研究的汉学家立传，故除黄、顾外，江藩此书对于汉宋兼采者一概不予立传，其独尊汉学的编修意图十分清楚。

作为吴派门人，江藩在治学上谨遵师教，其学具有尊汉信古的特色。撰著《汉学师承记》，也不例外。在该书中，他对乾嘉汉学吴、皖等派学者的评述，强调的不是他们之间的相异点，而是相同点，即都突出他们在学术要旨上尊汉信古的特色。实际上，吴、皖两派学者在治学上颇多相异之处，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归纳总结，但江藩对此不作强调，却有意突出他们作为乾嘉汉学学者的共同之处，显有大力彰扬汉学，突出其学术正统地位的用意。不仅如此，江藩还专门编有《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附于《汉学师承记》之后。该《目录》之编撰，是基于以下缘由与原则：“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以传中所载诸家撰述，有不关经传者，有虽关经术而不醇者，乃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仿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传注姓氏之例，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俾治实学者得所取资，寻其宗旨，庶不致混莠于苗，以珉为玉也。”“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②从这些文字看，江藩欲以《经师经义目录》补《汉学师承记》之不足，进一步展示清代汉学的纯正，所以专选那些“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来编入，将“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排斥在

①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见《汉学师承记》（外二种），158页。

② 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见《汉学师承记》（外二种），178页。

外。此种做法，更可见其用心。

对于江藩独尊汉学，甚至不无门户之见的《汉学师承记》，当时即有学者认为不妥。该书初编成时，自认是江藩晚辈的龚自珍就曾致信于他，指出该书“名目有十不安”，建议改书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信中言：“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①从这段文字来看，龚自珍所以建议江藩改书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主要理由在于“汉学”二字不能概括清朝开国以来的学术，其本身也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尤其在汉宋问题的处理上，实存偏差，“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所以，这样的写法，有明显的门户之见，不易为世人接受。

龚自珍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汉学师承记》不满，特别是宋学家表示了强烈反对之意。为此，江藩不得不略示退让，撰《国朝宋学渊源记》以调停。他曾自述撰述意图，说：“藩少长吴门，习闻硕德耆彦谈论，壮游四方，好搜辑遗闻逸事，词章家往往笑以为迂。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按指惠士奇）手书楹贴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藩为是记，实本师说。”^②这段文字，表面上看对宋学抱尊崇态度，实则仍未脱离汉学家基本立场，江藩只不过是谨遵师说而已。吴派惠氏主“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认为能将汉儒训诂之学与宋儒立身之学统一起来，知行合一，方为大儒。也就是说，他们对宋儒立身制行之长是肯定的，所否定者只是宋儒性理之学。在这个意义上，

① 龚自珍：《与江子屏笺》，见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346～3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② 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见《汉学师承记》（外二种），187页。